

“新双高”高职院校绩效评价的逻辑理路、现实审思与进路选择

郭丽君 何卓君

摘要:“新双高”高职院校绩效评价是引领新时期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制度安排,其评价重心呈现出由内部条件保障向外部贡献彰显的深刻转变。基于CIPP模型构建涵盖背景、输入、过程与结果的评价分析框架,并通过对首轮建设院校的评价实践审视,发现现行绩效评价体系仍存在多重内在张力,亟须构建分类引导的评价体系、确立显隐并重的资源配置范式、完善全周期动态监测机制,以及拓展多维综合的价值表征路径,实现绩效评价体系的整体调适,以有效引导“新双高”高职院校达成“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建设目标。

关键词:“新双高”;高职院校;绩效评价;产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717(2026)03-0109-09

2025年2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2025—2029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指出,“要发挥绩效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引导高职学校坚定服务导向的办学理念”,并围绕“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条件基础的支撑度、建设措施目标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和成果成效的贡献度”构建评价标准框架,保障新一轮“双高计划”(以下简称“新双高”)高职院校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建设目标^[1]。然而,绩效评价如何精准发挥其“指挥棒”效能,切实引导高职院校将国家战略要求内化为办学实践并转化为高质量建设成效,仍是一个亟待深入探究的核心问题。

随着“双高计划”绩效评价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研究焦点已从初期关注指标体系的构建,逐渐

转向对评价方法与范式的深度反思。早期研究多致力于引入新的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构建更具科学性的全过程评价模型^{[2][72]}。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开始强调应重视建设过程中的典型案例与质性证据,并将提升此类内容的评价权重视为增强评价实效的关键^[3]。尽管这些探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其研究多聚焦于首轮“双高计划”的建设经验。对于“新双高”在战略导向与评价逻辑上的根本性转变,其在预见性与适用性方面已显滞后,亟须在新语境中展开系统性审思。本文聚焦“新双高”高职院校绩效评价,在明晰其内涵框架与逻辑理路的基础上,结合首期建设的实践表象审视其延续性挑战,进而探索科学、适配、可持续的调适路径,以期为高职院校有效回应评价导向、提升建设实效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收稿日期: 2026-02-20

基金项目: 202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基于人工智能的教育评价生态系统构建及其实效研究”(A1A250029)。

作者简介: 郭丽君,湖南湘潭人,教育学博士,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湖南高职专业认证委员会秘书长,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何卓君,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长沙,410128。

一、“新双高”高职院校绩效评价的内涵框架

绩效评价是对组织或个人工作成果与效率进行系统性评估的过程。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设定科学的评价指标、收集绩效数据、进行严谨分析评估并提供有效反馈,来衡量实际绩效与预设目标或标准之间的差距,从而为改进决策提供依据^{[2][67]}。2020年12月,《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绩效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明确指出,“绩效评价是学校、中央及省级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对建设成效进行客观、公正的测量、分析和评判。绩效评价按评价主体分为学校绩效自评和部门绩效评价,评价工作应当做到职责明确、相互衔接、科学公正、公开透明”^[4]。“新双高”高职院校绩效评价,特指依据国家第二轮“双高计划”系列政策文件,对入选项目建设单位进行的专项绩效评价,目的是衡量“新双高”高职院校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预设目标,并促进院校的持续改进与发展。

虽然从评价的主体和过程来看,新一期绩效评价延续了首期建立的基本框架,涵盖学校、教育部和财政部、第三方机构等多元主体,以及学校自评和部门评价等评价方式,但“新双高”高职院校绩效评价在首期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外部贡献导向。首期评价聚焦教育系统内部的资源条件和建设成果,主要围绕产出、效益和满意度三大一级指标以及数量、质量、时效、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服务对象满意度六个二级维度展开,总体上侧重于自身积累与成果展示^[5]。新一期评价则重点关注高职院校在“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一目标下的建设成效,围绕思政工作引领度、社会需求匹配度、条件基础支撑度、建设措施目标可达成度、政策机制保障度与成果成效贡献度六大评价维度,推动高职院校更加主动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其中,思政工作引领度是根本前提,决定了人才培养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底色,旨在评价院校是否坚持正确的育人方向,为所有建设内容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社会需求匹配度是目标导向,检验专业群建设是否与外部经济产业需求高度契合,它既是专业群建设的逻辑起点,也是衡量其建设内容的客观准

绳;条件基础支撑度是物质保障,关注院校内外部资源是否足以支撑目标实现,不仅包括“双师型”教师队伍、实践教学基地等内部硬实力与治理体系等内部软实力,也涵盖校企合作共建平台、行业企业支持投入等外部资源的支撑能力,共同构成建设过程平稳运行的基础;建设措施目标可达成度是过程核心,重点考察院校“五金”(金专业、金课程、金教材、金师资、金基地)的系统构建与改革实效,是衔接规划目标与建设成效的关键执行环节;政策机制保障度是关键依托,超越学校自身,审视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是否提供持续稳定的政策、资金与合作支持,稳定的校企关系、顺畅的行业沟通机制以及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共同构成院校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成果成效贡献度是综合标尺,集中衡量成果对服务社会发展、支撑产业升级、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等方面的实际贡献,体现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社会价值与外部效能。

从这些维度的内在逻辑可看出,新一期绩效评价在继续关注院校内部教学资源与能力建设的基础上,显著提升了对院校服务外部发展效能的考察权重。此外,六大评价维度彼此关联、层层递进,形成相互驱动、循环作用的价值判断体系,与其他评价核心要素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评价生态系统。在宏观架构上,该系统构建起由设计层、执行层、结果层与反馈层构成的动态演进体系。其中设计层紧扣外部需求,以达成国家战略支撑与职业教育价值体现的双向互融;执行层则依托多元主体开展协同评价,进而实质性驱动院校内部的治理改进;结果层以高职院校办学实践为核心载体,深度践行以评促建与以践验评的评价理念;最终的反馈层通过检验建设成效,实现客观成果彰显与价值衡量尺标的内在统一。内外部各要素协同发力,共同塑造了从响应外部战略需求输入到输出高质量建设成效的完整逻辑链条(图1)。

二、“新双高”高职院校绩效评价的逻辑理路

CIPP评价模型为深入揭示“新双高”高职院校绩效评价体系贯穿“战略输入—建设过程—成效输出”的全链条逻辑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视角。该模

型由美国评价学者斯塔弗尔比姆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是一种以决策为导向、强调形成性功能的综合性评价框架,旨在通过对背景、输入、过程和成果的系统评估,为教育项目的持续改进提供依据^[6]。其特点与“新双高”高职院校绩效评价体系具有高度内在适配性。一方面,评价体系强调服务国家战略的“背景”导向、注重资源与政策保障的“输入”基础、关注“五金”建设等关键改革“过程”并最终落脚于贡献度的“成果”衡量,这与CIPP模型的四维结构存在清晰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CIPP模型强调评价的形成性功能,即服务于发展与改进^[7],与“新双高”建设“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政策初衷高度一致。“新双高”高职院校绩效评价体系所构建的“六个维度”框架,蕴含着从目标设定、条件保障、过程执行到成果验证的严密逻辑。依据CIPP模型,可以将这六个维度系统性地归入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从而揭示其完整评价循环的内在结构。

(一) 背景评价: 思政工作引领与需求适配的办学定位逻辑

背景评价处于评价循环的逻辑起点,其核心职能在于对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与战略方向进行根本性审视,旨在回答“为何而建”的战略原点问题。在“新双高”绩效评价体系,这一逻辑通过“思政工作引领度”与“社会需求匹配度”的双重校验得以确

立,其实质是对高职院校办学合法性的深度考量。

从组织社会学视角来看,组织不仅要在技术环境中通过高效率的生产活动获取资源,更需要在制度环境中通过遵循社会规范、价值观和信念系统来获取合法性,以确立其社会存续的基础^[8]。正如萨奇曼所言,合法性是“一种一般性的感知或假定,即认为在一个社会建构的规范、价值、信念和定义体系内,一个实体的行动是合意的、适当的或合适的”^[9]。在“新双高”高职院校绩效评价中,“思政工作引领度”正是这种制度合法性审查的集中体现。该维度将立德树人确立为评价体系的最高逻辑前置,引导院校超越单纯的技术传授,构建深度融合专业知识传授、实践能力培养与价值理念塑造的育人生态。这种逻辑设定确保了人才培养的价值理性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为后续所有的建设活动提供了根本性的政治背书与精神路标。“社会需求匹配度”则体现了组织对技术环境的适应性要求。高职教育作为一种跨界教育类型,其生命力根植于对外部经济社会变迁的回应性。该维度遵循“需求导向”的工具理性逻辑,将评价范围延伸至教育系统之外,着重诊断院校的专业群布局、人才培养规格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技能升级之间的契合程度^[10]。通过这种“适配性诊断”,评价机制将外部的产业逻辑转化为内部的办学逻辑,使得专业群建设不再是象牙塔内的自我设计,而是对区域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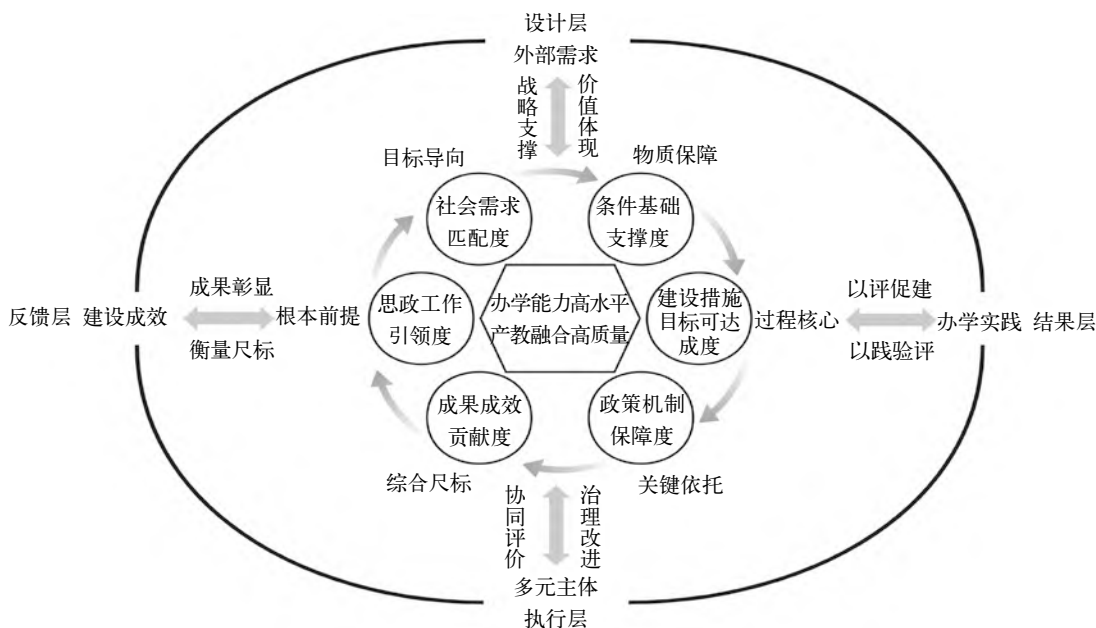


图1 “新双高”高职院校绩效评价内涵框架

战略的精准响应。思政工作引领确立了学校办学在制度环境中的政治高度,社会需求匹配锚定了办学在技术环境中的现实精度,两者共同完成了对项目建设战略原点的逻辑确证。

(二) 输入评价: 基础保障与资源供给的条件支撑逻辑

输入评价关注建设目标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其核心职能在于对承载建设任务的资源基础与环境保护进行可行性审视,旨在回答“凭何而建”的物质依托问题。在“新双高”绩效评价体系中,这一逻辑超越了对静态资源存量的简单盘点,通过“条件基础支撑度”与“政策机制保障度”的协同考察,确立了从单一要素占有向多元资源聚合转型的配置导向。

“条件基础支撑度”构成了内部资源配置的实体内核。资源不仅是组织开展生产活动的物质前提,更是其核心竞争力的直接表征。该维度的评价视域从显性的“物”延伸至隐性的“能”,既涵盖了“双师型”教师规模、实训基地能级等硬件指标的测度,更深层地指向内部治理体系现代化、质量文化生态等软实力的评估。这种逻辑设定意在通过评价的甄别功能,判断院校内部的资源结构是否形成了支撑高水平建设的“核心能力”,以及治理机制是否能够保障存量资源的高效流转,确保内部条件成为达成预定目标的坚实底座。“政策机制保障度”则指向外部环境支持系统的稳定性与有效性。高职院校作为嵌入在区域经济社会系统中的开放组织,其办学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部资源的汲取能力。该维度重点考察地方政府的政策供给强度以及行业企业的实质性投入程度,其评价重心不再仅仅是“有什么”,而是“能调动什么”。通过审视政府、行业、企业是否与院校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输入评价确立了多元主体协同投入的资源配置逻辑^[11]。这种对内外部支撑条件的综合考量,为高职院校突破“内卷化”封闭办学的路径依赖、实现协同育人提供了可行的资源与环境依据。

(三) 过程评价: 措施落实与目标达成的过程监测逻辑

过程评价构成了连接资源投入与最终成果的关键枢纽,关注的是学校在建设期内的实施质量与执行轨迹。在“新双高”评价体系中,这一环节不再满足于对既定任务的静态核查,而是通过对“建设措

施目标可达成度”的考察,确立了对学校改革行动进行全周期系统诊断的逻辑导向。

这一评价逻辑首先体现为对学校“五金”建设系统性的审视。高职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往往面临要素割裂的风险,即学校在各领域的改革单兵突进,难以形成合力。过程评价将“金专业、金课程、金教材、金师资、金基地”视为一个相互嵌套、逻辑自洽的生态系统,而非孤立的指标集合。评价机制在此处致力于识别学校内部的改革要素是否实现了有效统整。例如,高水平师资是否支撑了课程改革,实训基地是否服务于专业群建设,从而判断各项改革措施之间是否存在逻辑断裂或资源空耗。这种系统观的引入,使得评价视角从关注学校“做了没有”的合规性检查,升级为关注“是否形成合力”的内涵式诊断,确立了以系统集成为导向的行动逻辑。进而言之,过程评价还承载着对学校改革实施有效性的动态纠偏功能。学校的建设活动是一个流动的、生成的复杂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12]。该维度关注学校既定的建设路径是否得到扎实执行,阶段性目标是否如期达成,以及资源投入是否转化为预期的过程性产出。通过建立伴随式的数据反馈机制,评价主体能够及时发现学校建设行为偏离预定目标的信号,并提供即时的改进策略。这种动态监控机制将绩效评价的重心从“事后算账”前移至“事中控”,确保了学校的建设活动始终沿着预定目标轨迹运行,强化了过程执行的有效性。

(四) 结果评价: 成果产出与增值贡献的价值确证逻辑

结果评价承载着对项目建设成效进行综合判定与价值归因的任务,回答了“建成何效”这一根本性的价值追问。“成果成效贡献度”超越了单纯的产出统计,转向对结果与影响的深度挖掘,确立了以“贡献度”为核心的价值确证逻辑。

这一评价维度引入公共价值理论视角,审视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所释放的社会溢出效应。正如穆尔所言,公共管理者应当致力于寻求、确定和创造公共价值,公共价值不仅包括高效和有效地达成规定的目标,还应考虑社会公平、公民满意度以及对社区需求的回应性^[13]。评价体系不再局限于校园围墙内的自我确证,而是将视域投向广阔的社会场域,衡量建设成果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支撑产业技术升级、推动职业教育模式创新以及提升国际化水平等方面的实际增值。通过对人才培养的社会适配性、技术研发的产业贡献度、社会培训的人力资本增值等可量化指标,以及文化传承的公共价值、国家战略的支撑效能等质性维度的综合考量,评价机制打破了封闭的办学绩效观,关注教育投入如何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质力量。从整体视域来看,结果评价最终回应并验证了背景评价中“社会需求匹配”与“思政工作引领”目标的达成情况。具体而言,它不仅回答了“指标是否达成”的事实问题,更回应了“价值是否实现”的规范问题。这种对事实与价值的双重关切,既回应了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也确证了高职院校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从而完成了一个由战略需求出发、经资源支撑与过程改革、最终回归社会贡献的逻辑闭环。

三、首轮“双高”高职院校绩效评价的实践审视与延续性挑战

尽管“新双高”建设提出了“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全新目标愿景,但绩效评价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往往表现出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首轮“双高计划”的绩效评价实践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折射出传统评价逻辑在适应性、表征度与系统性等方面的深层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若未被充分审视与矫正,极易在新一轮评价中发生代际延续。因此,透过首期建设的表象,揭示跨越新旧周期的延续性挑战,是优化“新双高”高职院校绩效评价体系的逻辑起点。本研究基于数据的代表性与可获得性,选取湖南省11所首轮“双高计划”建设院校的中期绩效自评报告作为分析载体。一方

面,鉴于首轮终期验收数据尚未全面公开,且相较于终期评价侧重于成果展示的总结性陈词,处于建设承上启下关键节点的2022年中期自评更能真实暴露建设过程中的运行痛点与实际困境;另一方面,湖南省作为全国部省共建的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其入选院校涵盖了理工、农林、医卫、人文艺术等多元办学类型,样本构成具有广泛的覆盖面与典型性,足以支撑对高职院校绩效评价实践的系统性分析(表1)。

(一) 背景适配冲突: 统一评价标准与多元办学定位的张力

背景评价作为确证办学定位合法性的逻辑起点,理应关注院校在特定时空场域内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与贡献度^[14]。然而,高职院校作为嵌入特定产业与文化环境的异质性组织,其办学逻辑通常受制于所属行业特征与学科属性,统一的评价体系难以兼顾不同服务面向与定位的院校,导致评价引导与特色发展之间产生张力^[15]。

在思政工作引领度的评价维度上,样本院校在自评报告中普遍表现出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教学体系的描述趋同,校本特色育人模式的呈现较为相似。诸如具有红色基因的航空类院校S9与侧重民生服务的社科类院校S2,两者在思政育人上的特色路径因缺乏差异化的观测指标而未能得到充分彰显,导致部分院校在追求指标达标的过程中,未能充分呈现对思政工作实质引领力的深度挖掘。究其原因,基于统一标准的评价方式,难以全面识别不同类型院校在思政育人载体与路径上的异质性。在社会需求匹配度的评价维度上,统一标尺与特色办学的适配性矛盾更为明显。轨道交通类院校S1与汽车工程类院校S6因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紧密耦合,

表1 研究样本信息概览

样本编码	院校名称	办学属性/类型	专业群特征与服务面向
S1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类(轨道交通)	聚焦轨交装备制造全产业链
S2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服务类(民生)	聚焦社工与康养,服务民生
S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类(化工)	对接现代化工,重研发工艺
S4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类(装备制造)	立足工程机械与智能制造
S5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艺术类(文创)	依托非遗,服务文创与工艺
S6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理工类(汽车工程)	聚焦智能网联汽车研发服务
S7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农林类(种业)	服务种业安全与乡村振兴
S8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服务类(餐饮旅游)	聚焦湘菜与现代服务业
S9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军事/理工类(航空)	服务航空维修与国防军工
S10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类(路桥)	服务交通战略,侧重路桥工程
S11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医卫类(护理)	侧重基层卫生与医疗服务

在通用指标上表现突出;而艺术类院校S5在非遗文化传承、医卫类院校S11在基层医疗服务等领域的独特社会需求匹配度,因缺乏相适配的量化评价工具,在绩效呈现中未能充分体现。这种评价结构上的不均衡,可能引导部分特色院校在定位上向通用标准靠拢,从而弱化对特定区域与行业需求的精准响应。如何在坚持统一指导思想的前提下,更真实地反映院校在思政工作引领与需求匹配上的特色差异,是新一轮评价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二) 输入配置失衡: 显性评价指标与隐性支撑能力的张力

在首期评价实践中,基于项目制的资源配置逻辑往往使评价重心向资金、设备、基地面积等显性物理要素倾斜,而对保障资源高效运行的治理体系、制度规范等隐性能力的考察则相对不足^[16],导致显性资源集聚与隐性能力支撑之间呈现非均衡状态。

来自自评数据来看,样本院校在显性资源的获取与配置上普遍表现良好。服务类院校S8与医卫类院校S11在资金到位率与执行率指标上均达到较高水平,硬件设施改善与实训基地扩建成为常见建设亮点。然而,显性指标的高达成度未必直接对应办学支撑能力的整体提升。在内部治理与机制建设方面,多所院校反映出与资源投入规模不匹配的软实力短板。例如,S11指出引进高层次领军人才存在困难,化工类院校S3表示产教融合的长效运行机制尚未成熟,艺术类院校S5亦提及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诊改工作仍需深化。这种“硬投入”与“软治理”之间的落差,揭示输入评价在指标设计上可能存在局限。高权重的资金与硬件指标可能引导院校将重心置于资源获取与堆砌,相对忽视资源配置效率与治理现代化这一核心议题。若“新双高”输入评价未能在政策机制保障度等维度增设更具深度的观测点,并对资源背后的制度环境与治理效能开展实质性考察,则资源投入的边际效益可能难以持续提升。

(三) 过程监测迟滞: 任务线性达成与内涵质量生成的张力

过程评价应对“五金”新基建的实施质量进行有效把控,确保各关键要素不仅在数量上达标,更在内涵上实现高水平供给。然而,对首期建设自评报告的分析显示,现有过程评价体系在对“五金”

要素的考核中存在一定的“内涵级差”,即对硬件设施与常规任务的考核相对刚性,而对课程资源与教材改革等“软基建”的评价约束力则稍显不足。

从样本院校的反馈来看,部分院校在完成专业群组建等架构性任务的同时,核心教学资源建设方面仍存在质量短板。例如,航空类院校S9在自评中指出,其在国家级规划教材、教学成果奖等标志性成果方面产出不足,与高水平建设目标仍有差距。农林类院校S7也反映,其教学资源建设步伐有待加快,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新形态教材等核心指标建设存在滞后。这种“专业建设先行、资源供给滞后”的非同步现象,反映出过程评价在推动“五金”要素同步升级方面的作用有待加强,以避免部分关键要素在建设期内处于“洼地”状态,影响人才培养新基建的整体成效。此外,过程评价在实施动态监测与伴随式诊断方面仍有一定提升空间,其对建设过程中深层技术瓶颈与适应性难题的预警能力仍显不足。理想的动态监测应能及时反馈建设进度与产业技术变革之间的匹配度,但在实践中,评价机制往往滞后于建设实际。若“新双高”高职院校绩效评价未建立高灵敏度的动态监测体系,可能难以在建设周期内实现对关键办学能力生成过程的持续优化与精准调控。

(四) 结果表征窄化: 单一经济向度与多元社会价值的张力

绩效评价应力求全面反映职业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所彰显的多元社会价值。审视首期评价实践,由于对量化方法的依赖,评价体系对可货币化的经济产出捕捉能力较强,而对文化传承、社会公平、国家战略服务等长效性、隐性公共价值的映射能力则相对有限^[17]。

在以技术服务到款额、横向课题经费为代表的经济性指标评价中,不同类型院校的贡献度呈现结构性差异。S1、S4、S6等工科类院校凭借技术转移转化优势,在绩效表现中较为突出;相比之下,航空类院校S9在国防军工人才培养、农林类院校S7在种业安全与乡村振兴、医卫类院校S11在基层卫生服务等方面的贡献,虽具有显著的社会价值,却因难以转化为经济指标,在现有评价框架中未能充分体现。这并不意味着非工科院校贡献不足,而更可能反映出现有评价工具在捕捉多元公共价值方面存

在局限。若评价体系长期保持此类非均衡的价值映射,可能促使院校倾向于追逐短期经济效益,而减少在公益性、基础性或长周期项目上的投入。这不仅可能偏离职业教育服务社会发展的初衷,也可能影响职业教育生态的多样性。因此,“新双高”结果评价有必要进一步拓展价值衡量的维度与深度,探索构建统筹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综合评价模型。

四、“新双高”高职院校绩效评价的进路选择

审视既有绩效评价体系在引导高职院校特色化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效能、保障过程建设质量及全面表征综合价值等方面存在的现实挑战,推动评价范式从合规性验证向发展性赋能转型已成为深化“新双高”建设的必然要求。遵循“以评促建、以评促强”的政策内核,绩效评价体系的完善应致力于构建更具前瞻性、诊断性与引领性的实施路径。具体而言,需系统构建促进特色发展的分类评价体系,确立显性与隐性能力并重的资源配置评价范式,完善全周期伴随式的动态监测机制,并拓展以多元证据为基础的综合价值表征。通过这些维度协同发力,方能为牵引高职院校实现内涵式、特色化、贡献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与实践框架。

(一) 构建促进特色发展的分类评价体系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强调“建立分类管理、分类评价机制”,推进教育改革创新、部署高质量教育体系^[18]。背景评价中“统一标尺”导致的制度性同构,抑制了院校的特色办学活力。为此,在统一绩效评价基础上加强科学分类,是破解标准化衡量与特色化实践之间矛盾的关键,也顺应了新时代高职院校特色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面对多元院校生态与统一国家战略的双重要求,应以“新双高”绩效评价的六大维度为核心框架,首先确立所有高职院校建设成效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尺度与合格基准。在此基础上,需构建科学合理的分层分类评价机制,以突出特色创新、提升办学效益^{[19]30}。在分层评价方面,随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稳步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涵盖专科、本科乃至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等多个层次^[20]。各层

次在人才培养目标、规格上存在本质差异,这就要求评价必须区分层次,引导院校聚焦本层次办学定位,避免不同层次院校间的简单横向比较,确保各类院校都能在各自领域办出特色与水平。在分类评价方面,需针对同一层次内院校在服务面向、发展禀赋上的异质性,设计差异化的价值衡量体系^{[19]29}。例如,对服务国家战略型院校,应重点考察其与重大战略的对接深度与贡献效能;对支撑产业集群型院校,需侧重评价其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实效^[21];对技术创新引领型院校,应着重衡量其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与前沿突破能力;对服务特色发展型院校,需评估其文化传承创新与特色品牌塑造能力;对服务社会民生型院校,则应侧重考察其公共服务质量与民生保障水平。通过将“层次+类型”的二维分类框架与绩效评价的六大维度有机结合,既能确保评价工作坚守国家基准底线,又能精准识别并激励各类院校的特色贡献。这有助于推动绩效评价实现从“统一性”向“差异化”、从“共性达标”向“特色卓越”的根本性转变,最终形成百花齐放、各展所长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二) 确立显隐并重的资源配置评价范式

输入评价不应止步于对静态资源存量的盘点,而应深入探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与支撑能力的生成机理。针对当前评价中显性指标过载与隐性能力遮蔽的失衡问题,新一轮绩效评价须确立“显隐并重”的资源配置评价范式,推动评价视域从单纯的“物本”投入,向“人本”效能与“制度”活力拓展,最终揭示资源投入转化为办学能力的真实效率^[22]。

践行这一范式,首要的是对“条件基础支撑度”与“政策机制保障度”的评价进行深度重构。在评价内部条件时,应超越对“双师型”教师比例、实训设备总值等静态存量的核查,转而设置一系列反映资源活化程度与产出效能的指标。例如,考察师资队伍不应止于资格证书,而应着重考察其参与企业技术革新、将实战项目转化为教学案例的实际成效;评估实训基地不仅要看设备先进性,更需分析其生均年使用时数、承担社会化培训与技术服务项目的质量。这实质上衡量的是资源转化为教学创新与技能积累的效率。在评价外部环境保障时,重心须从考核合作协议、支持文件的数量,转向诊断这些政策与合作的“运行效能”与“实质产出”,应重

点审视地方政府专项政策是否精准破解了院校发展的关键制度瓶颈,校企共建的技术平台或产业学院是否形成了权责清晰、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治理机制。评价应通过追踪具体案例,如一项联合技术攻关如何反哺了教学,一个共建基地如何稳定输送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来验证外部支持的“有效供给”程度。这种以“效能增值”为导向的输入评价,旨在形成一种发展牵引,促使院校将建设重心从资源的外部获取,转向内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资源整合运用能力的系统性提升^[23]。

(三) 完善全周期伴随式的动态监测机制

过程评价的本质是对建设质量进行动态诊断与持续改进,而非对建设任务进行机械核验。为破解当前评价中任务线性达成与内涵质量生成错位的监测滞后问题,应依托数字化转型,利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24],重塑过程评价的技术路径,推动其从“静态核查”向“动态预警”升级,构建全周期、伴随式的智能监测体系。

其一,建立基于知识图谱的“五金”建设关联度分析模型。突破传统评价对金专业、金课程、金师资等要素的割裂式统计,利用知识图谱技术挖掘各要素间的逻辑耦合关系。重点监测高水平师资是否实质性参与核心课程重构,实训基地运行数据是否有效支撑教学改革,科研平台成果是否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通过对要素耦合度的量化分析,精准识别“专业群组建但课程未互通”“基地建成但教学未利用”等结构性问题,确保各项改革形成逻辑闭环与育人合力,防止改革流于形式。其二,实施基于全量数据的伴随式诊断与即时纠偏,构建覆盖数据采集、处理、分析与反馈的全链条治理机制^[25],依托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与院校状态数据采集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数据采集与分析机制。设定关键建设指标的预警阈值,一旦系统监测到某项任务偏离预定轨道或进度滞后,即可自动生成预警报告并反馈至院校。这种“边建设、边诊断、边改进”的动态模式,将评价重心从期中、期末的“事后核验”前移至建设全过程的“事中调控”,有效避免“前松后紧”与突击迎检,确保内涵建设持续稳健推进。

(四) 拓展以多维证据为基础的综合价值表征

结果评价承载着价值确证与成效归因的最终任务,应全面反映职业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所产生

的多元外溢价值。为实现全面、公正的价值表征,结果评价须突破对单一经济量化指标的依赖,转向构建一个能系统衡量经济贡献、技术贡献、社会贡献、文化贡献及教育发展贡献的综合评价体系。

首先,应重构“社会贡献度”的多元价值坐标。在合理保留技术服务到款额、专利转化率等经济指标的同时,需显著增设并强化体现职业教育社会属性与战略功能的价值维度。具体而言,对于服务国家战略型院校,应重点评估其在突破“卡脖子”技术、服务国防安全等方面的战略支撑能力;对于农林类院校,需着重考察其在乡村振兴、种业安全等领域的公益性服务规模与实际成效;对于艺术类院校,则应侧重衡量其在非遗技艺传承、民族文化创新等方面的文化影响力。通过构建差异化的价值坐标,使各类院校的独特贡献都能在评价体系中获得公允呈现,从而破解“唯经济论”导致的价值表达失衡。其次,应探索建立基于社会溢出效应的中长期影响力评价机制。职业教育的价值具有显著的滞后性与延展性,仅凭年度产出统计难以衡量其深远影响。评价机制可尝试引入毕业生职业发展质量追踪、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关联度分析等长周期评价工具,系统评估职业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稳定区域就业、提升产业技术能级等方面的长期效应。通过将评价重心从短期的“产出数量”转向长期的“结果质量”与“社会影响”,引导高职院校超越功利化的短期绩效观,真正回归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区域发展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价值本位^[26]。

参考文献

- [1] 中国教育在线.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2025—2029年)的通知[EB/OL].(2025-02-19)[2025-06-20].https://www.eol.cn:10443/zhengce/wenjian/202502/t20250219_2655130.shtml.
- [2] 沈璐,徐爱亲.基于OPPM理论的全过程“双高计划”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24(27).
- [3] 李昱,郭广军.“双高计划”建设成效评价中典型案例的主要作用、存在问题与反思改进:基于56所高水平学校的Nvivo12.0质性分析[J].教育与职业,2024(1):50-57.
- [4]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B/OL].(2020-12-23)[2025-10-21].https://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737/s3876_qt/202012/t20201225_507515.html.
- [5] 刘斌,邹吉权.“双高计划”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内涵分析

- 与权重确定[J].中国高教研究,2021(4):96-102.
- [6] Stufflebeam D L.The CIPP Model for Evaluation [M]//Stufflebeam D L,Madaus G F,Kellaghan T.Evaluation models:viewpoints on educational and human services evaluation.2nd ed.Norwell: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0:279.
- [7] 林传舜,刘子琦.再谈CIPP模型“作为改进系统的策略”[J].教育学报,2025(1):195-207.
- [8]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74-75.
- [9] Suchman M C.Managing legitimacy: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3):571-610.
- [10] 任洁华,任君庆.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导向变化与建设方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7):28-32,41.
- [11] 刘晓.从“内涵筑基”到“战略支撑”: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双高计划”迭代逻辑与战略选择[J].职业技术教育,2025(15):8-14.
- [12] 邵建东,孙凤敏,俞慧刚.高职院校办学模式构建的现状审视与优化策略:基于全国56所首轮“双高计划”建设学校的文本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25(3):94-100.
- [13] MOORE M H.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M].伍满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6-37.
- [14] 邵建东,韦清,王瑞敏.高职院校转型发展的现实困境及突破路径[J].江苏高教,2023(3):120-124.
- [15] 刘晴.“双高计划”项目建设绩效评价的价值逻辑[J].职教论坛,2021(12):155-158.
- [16] 刘晓,钱鉴楠.“双高计划”中期建设绩效与评价的若干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23(3):84-90.
- [17] 杨虹,龚添妙.“双高”建设实施绩效评价的逻辑解构及突破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4):86-92.
- [18] 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OL].(2025-01-19)[2025-10-21].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9913.html.
- [19] 刘晓,刘晓宁.“新双高”背景下的高职院校分类评价:现实诉求、实施框架与行动思考[J].职教论坛,2025(5).
- [20] 郭丽君,周建力.困顿与突破:高等职业教育的生态位辨析[J].现代教育管理,2022(4):93-101.
- [21] 郭丽君,程芳.产业发展视角下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问题表征与发展路向[J].现代教育管理,2024(8):108-118.
- [22] 杨晓珍,施星君,毛海舟.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能力内涵、评价与建设[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5(1):139-145.
- [23] 陈新民,高飞,张朋,等.资源整合视角下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绩效评价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2):155-162.
- [24] 杨文杰,张珏.教育强国视域下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体系构建:指标要素及着力点[J].大学教育科学,2024(2):24-31.
- [25] 郭丽君,刘桂锋.美国研究型大学数字治理的运行逻辑、实践体系与基本特征:基于美国4所研究型大学的案例分析[J].现代大学教育,2025(4):54-63.
- [26] 金婉莹,庄榕霞.从“关于学习的评价”到“作为学习的评价”:元评价视域下智能技术支撑学习评价的有效性探索[J].中国远程教育,2025(5):92-107.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New Double High Level Vocational Colleges: Logical Rationale, Practical Reflections, and Path Selection

GUO Lijun HE Zhuojun

Abstract: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new double high level vocational colleges constitutes a critic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steering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ts evaluative focus has undergone a significant shift from emphasizing internal condition assurance to highlighting external societal contributions. Drawing upon the CIPP (Context, Input, Process, Product) model,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context, input, process, and outcomes. Through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the evaluation practices implemented in the first round of designated institutions, the study identifies multiple inherent tensions within the curr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it is imperative to develop a classification-oriented evaluation system, establish a resource allocation paradigm that balances both explicit and implicit dimensions, improve full cycle dynamic monitoring mechanisms, and expand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es to value representation. Such comprehensive adjustments to the evaluation system are essential to effectively guide new double high level vocational colleges in achieving the dual objectives of high level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nd high quality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Key words: new double high level; vocational college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黄建新)